

语
言文
学从
著文
学之部
主编霍松林

07·41
4
陕西人
民大
学社



语言文学丛著

时代的广角镜

吴功正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商洛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5.5印张 112千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统一书号：9094·121 定价：1.20元

目 次

一	明代短篇小说概况	(1)
	(一) 明代短篇小说的社会土壤	(1)
	(二) 明代短篇小说的基本风貌	(9)
二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高峰——“三言”	(18)
	(一) “三言”的编撰以冯梦龙的文学观为理论基础	
		(18)
	(二) “三言”传递出市民阶层的心声	(23)
	(三) “三言”的艺术成就	(40)
三	“二拍”和其它拟话本、文言短篇小说	(71)
	(一) 应当全面地估价“二拍”	(71)
	(二) 明代的文言短篇小说和其它拟话本	(83)
四	清代短篇小说的明珠——《聊斋志异》	(88)
	(一) 坎坷潦倒 艰苦玉成	(88)
	——蒲松龄的生平概略	
	(二) 孤愤之书 寄托之作	(93)
	——《聊斋志异》的思想成就	
	(三) 刻镂尽态 摆曳多姿	(109)
	——《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	
	(四) 更相评骘 短篇绝唱	(140)
	——清代的《聊斋志异》评论	
五	《阅微草堂笔记》和清代其它文言短篇小说	(158)
后	记	(170)

一 明代短篇小说概况

中国古代小说是一朵迟开的鲜花。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它的发展相当缓慢。但是，迟开的鲜花一样地鲜艳夺目，姗姗来迟的步履却显示出后来居上的姿态。从最初意义的小说雏型到魏晋六朝的志怪、志人小说、唐人传奇，再经宋代话本，不象诗歌那样滚滚浪滔，而是时有潮汐涨落。元、明之际，长篇《三国演义》、《水浒传》相继问世，为小说赢得了空前的荣誉、但是，随后的中国小说界又出现了寂寞的局面，这种局面大约维系了一百多年。在跌落下去的潮水之后，又掀起了新的浪头，这就是明代中后期出现的神话小说《西游记》、人情小说《金瓶梅》、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等。在大的浪涛中，伴之以明代白话、文言短篇小说，蔚为巨浪喷雪似的壮观，从而在中国小说史上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时期。

明代短篇小说的兴盛不是偶然的，它有着特定的土壤和历史原因。

（一）明代短篇小说的社会土壤

一部或一批文学作品，不仅有其社会性，而且其诞生还有特定的历史土壤。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因素孕育着一定的物质产品，也孕育着一定的精神产品。明代短篇小说的产生也体现了

这个艺术发展的规律。

明代自嘉靖（1522—1566）以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很大的提高。万历（1573—1620）初期，张居正任内阁首辅，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推行了“一条鞭法”。张居正的统一赋役法，抑制了豪强的漏税，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赋役征银，一方面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张居正的改革，使明朝的国民经济情况大为好转，“太仓所储，足支八年”^①。特别是他提出的“厚农而资商，厚商而利农”^②的主张，扶助了工商业，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生产，往往是山东、河南等地生产的棉花运往南方，南方织成的布匹再运往北方，所谓“北土广树艺而昧于织，南土精织衽而寡于艺，故棉则方舟而鬻于南，布则方舟而鬻于北”^③，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这时纺织工业多集中在江南地带，纺织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初步改变了家庭手工业的状况，而且对织机加以改造。“改机，故用五层。明弘治间，有林洪者，工杼轴，谓吴中多重锦，闽织不逮，遂改段为四层，故名改机”^④。当时苏州城内的纺织业已经具有相当规模：“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⑤

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南方的一些地主已经开始兼营工商。江南大地主徐显卿说：“倡率家人，妇女缫丝，僮仆耕

① 《张文忠公全集·文忠公行实》。

② 《张文忠公全集·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

③ 《元明事类钞》卷二四，引王象晋《木棉谱》序。

④ 明万历《福州府志》，卷三七，食货志十二，物产。

⑤ 《明实录》神宗卷三六一。

耘，惟勤有获。”^①可见，地主阶级已开始重视手工业生产。同时，南方的一些商人开始兼营手工业，在一些手工业部门中，已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当时的苏州“郡城之东，皆习机业，织文曰缎，方空曰纱。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授值。有他故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曰‘唤代’。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缎工立花桥，纺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延颈而望，如流民相聚，粥后俱各散归。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着矣”^②。又据《万历实录》所载：“吴民生齿最烦，恒户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十分清楚地表明当时的手工业工人已有明确的专业分工，标志着手工业的发展。同时，在手工业工人中既有“常主”的固定工，又有“无主”的临时工，他们靠出卖劳动力和手工技术维持生计。如果“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着矣”。这些机工“浮食奇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③，可以说是无产者了。而“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关系，则是雇佣劳动者和资本占有者之间的雇佣关系了。

在明代，不仅纺织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印刷业也有了新的改进。十五世纪中叶，无锡、苏州等地盛行铜活字印书。“近时大家多镌活字铜印，颇便于用”^④。嘉靖时，江南丹徒铸工还曾发明铅活字印书的方法^⑤。明代印刷业有三个特点，一是印刷业广泛发展，二是印刷精工，三是印刷费用低廉。明代李诩

① 《勤箴》，《西园闻见录》卷四十《益齋賦》。

②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七六苏州府部。

③ 《万历实录》卷三六一。

④ 明·唐锦：《龙江梦余录》卷三。

⑤ 陆深：《金台纪闻》。

说：“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今（隆庆、万历）满目坊刻，亦世华之一验也。”^①明代初期曾在南京集中了杭州技工和宋代书板，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南京也成了印刷业的中心。随着明成祖迁都北京，印刷中心也北移，但是，自嘉靖以后，南京城内仍大量刊印小说、戏曲等。又据明代谢肇淛所言：“近时书刻，如《冯氏诗纪》、《焦氏类林》及新安所刻《庄》、《骚》等本，皆极精工，不下宋人。”^②其印刷的精良程度已超过了宋刻本。这时已出现了彩色套印，如十七世纪中叶刊行的《十竹斋笺谱》，突出地反映了这方面的成就和水平。据清人叶德辉记述：“前明，书皆可私刻，刻工极廉。闻前辈何东海云：‘刻一部古注十三经，费仅百余金。’故刻稿者纷纷矣。”^③

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新型的资本主义萌芽，促成了一个新兴的市民阶层的兴起，它和封建势力逐渐产生矛盾。矛盾激化就出现了斗争，如苏州织工的暴动等。这些斗争的显著的特点，就是维护市民利益。例如松江府市民挽留李知府，是因为他“昭雪民冤”，对“匠役铺户，必计工给值，绝无留滞”。

市民阶层的兴起，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影响。李贽“童心”论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代表了市民阶层的愿望。由于市民阶层的兴起，也就相应地产生了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要求，这就需要有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去满足这种审美要求，这也是明代短篇小说产生的社会原因之一。

① 明·李诩：《戒庵漫笔》卷八。

②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

③ 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

市民阶层的兴起，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出现，使得整个社会生活丰富多彩，为明代短篇小说提供了写之不尽的素材，这是明代短篇小说产生的社会原因之一。

原因之三就是印刷业的发展，为小说的大量刊印提供了物质基础。

早在唐代，城市里就有“说话”，也就是讲故事的民间艺术，茶楼酒肆中活跃着“说话”艺人。唐代元稹的《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的“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记述的就是这种情景。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四《贬误》记载：

“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予令任道升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尝于上都斋会设此，有一秀才甚赏某，呼扁与褊同声，云世人皆误。’”这就可以看到当时“市人小说”业已出现。

到了宋代，说话艺术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突出地表现为两宋都市的繁荣及其对艺术的要求。《东京梦华录序》记述当时北宋都城东京的情景：“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梦粱录》这样描述杭州的景象：“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足见杭城繁盛矣。”这种分明有点畸形的两宋都市的空前繁华，促进了瓦子勾栏、茶楼酒肆里说话艺术的发展。说话艺术的类型更细了，即有所谓的“四家数”。耐得翁的《古杭梦游录》记述：“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拳提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

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参禅悟道；讲史书，谓说前代兴废争战之事。”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宋之话本》载为：一，小说；二，谈经（说经、说参）；三、讲史书（说史）；四，合生。“讲史”讲述前代兴衰的历史故事，一般都是长篇历史小说；“小说”讲述社会生活故事，一般都是短篇小说；“说经”讲述佛经方面的故事；听众即时出题，说话人即席讲述诗句，谓之“合生”。四种类型中，“小说”最盛，宋代话本篇目有一百几十种。“说话”人为了把所说的内容传授他人或流传后世，就逐步整理成文稿，几经加工，就成为“话本”，可以说是具有比较规范意义的小说。宋、元话本小说的影响到明代，便由文人进行模拟创作，这是通常所说的“拟话本”。明代拟话本的出现，使小说由口头文学进入书面文学，成为案头品了。明代拟话本对宋、元话本语言的通俗化、口语化，间以韵文、诗词等特点，既有继承，又有发展。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明之说话人亦大率以讲史事得名，间以说经诨经，而讲小说者殊希有。惟至明末，则宋市人小说之流复起，或存旧文，或出新制，顿又广行世间，但旧名湮昧，不复称市人小说也。”精辟地揭示了小说史的这条发展线索。

明代短篇小说的繁荣，不仅仅有经济上的原因，它还有着文学的历史继承关系。

明代文学思潮的基本倾向是反映市民的审美要求和理想，要求文艺表现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表现社会现实的世俗情态。这股文学思潮的社会基础是市民阶层。当时为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思潮，崛起了以王慎中、归有光、唐顺之、茅坤等人为代表的“唐宋派”。唐顺之在《答茅鹿门知县》中指出：“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唐宋而下，文

人莫不语性命，谈治道，满纸炫然，一切自托于儒家，……。极力装做，丑态尽露。”他在《与洪方洲书》中又指出：“近来觉得诗文一事，只是直写胸臆，如谚语所谓开口见喉咙者，使后人读之如见真面目，瑜瑕俱不用掩所谓本色，此为上乘文字。”“唐宋派”提倡直接抒发胸臆。归有光的散文《寒花葬志》、《项脊轩记》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取材于日常生活。这标志着文学作品已经在题材、内容、形式上出现了不同于前代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为以反映日常生活为内容的明代短篇小说奠定了基础。对伤心惨目的历史情景的描述，对金戈铁马的农民战争的纵情渲染，对叱咤风云的一代良将的生动刻画，逐渐让位于都市的旖旎风光、市民阶层的生动形象、琐细的日常生活……和“唐宋派”差不多同时的李贽公开主张：

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迹言也。①

夫唯以迹言为善，则凡非迹言者必不善。何者？以其非民之中，非民情之所欲，故以为不善，故以为恶耳。②

从一定意义上说，李贽从“人欲”的固有要求出发，去肯定“好货”、“多积金宝”的正当要求。这样，他就肯定了商人们的行为是天经地义的，从而也就充分肯定了包括商人在内的市民阶层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与这些相联系的是他提出了“童心说”。他在《焚书·童心说》中指出：“夫童心者，

① 李贽：《答邓明府》，《焚书》卷一。

② 李贽：《明灯道古录》卷下，《李氏文集》卷十九。

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他认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本，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他还赞扬了在市民阶层中流传的小说戏曲，反对道学思想，肯定市民意识：“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①李贽在评点小说过程中提出的小说理论，对明代短篇的创作实践也有着指导作用。李贽之后的袁氏三兄弟的“公安派”，提出著名的“性灵说”，在总的理论上和“唐宋派”、李贽是一致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善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②他们的散文小品多写日常生活，如《满井游记》等。明代的这股文学思潮，反映了社会的显著变动，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呼声，许多观点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人的解放、个性解放这个重大的社会主题。和这个时期差不多同时，西欧出现了以人文主义为内容的文艺复兴。中国明代的文艺思潮当然不是接受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它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给予生活在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到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冯梦

① 李贽：《焚书·答耿司寇》。

② 《袁中郎全集·序小修诗》。

龙、凌濛初等人以深刻的影响。那些小说中富有生活气息的画面，市井细民的活动，爱情的自由，婚姻的追求，幸福的憧憬，以至于性的解放，都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股思潮。市民阶层开始冲破封建阶级的桎梏而崛起，市民生活的丰富多样性也日渐得到多样化的表现，以至于爱情、婚姻具有了社会意义。反映市民意识的文艺思潮就这样深深地影响着明代的短篇小说。当然这股文艺思潮的不彻底性，和封建主义意识的混合，又使明代短篇小说显得比较复杂，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将要谈到。

（二）明代短篇小说的基本风貌

明代短篇小说以白话短篇为主峰，文言短篇为支脉。

文言短篇小说主要有：

瞿佑的《剪灯新话》。瞿佑（1341—1427），字宗吉，号存斋，明初钱塘（一作山阴）人。早年孚才名，但怀才不遇，只任过教谕、训导、长史之类的小官。永乐（1403—1424）年间因文字狱，被流放保安，十年后放归。著有《归田诗话》、《存斋诗集》等。短篇小说集《剪灯新话》作于洪武（1368—1398）年间，全书共四卷二十篇。作者自序说：“余既编辑古今奇怪之事以为《剪灯录》，凡四十余卷矣。好事者每以近事相闻，远不出百年，近只在数载，襞积于中，日新月盛。习气所溺，欲罢不能，乃援笔为文以纪之。”全书除反映封建社会（元、明之季）的黑暗腐败和表现爱情婚姻外，大都表现烟粉、灵怪一类题材。该小说集唐传奇文风，和宋代文言短篇小说粗拙的文风大相迳庭，对清代的文言短篇《聊斋志异》影响

甚大。这部小说集于明代就已传到国外。

李祯的《剪灯余话》。李祯（1376——1452），字昌祺，明初庐陵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及第，授翰林庶吉士，官至礼部郎中，迁广西、河南布政使。著有《容膝轩草》、《侨庵诗余》等。短篇文言小说集《剪灯余话》成书于永乐十八年（1420）。四卷二十篇（附《还魂记》一篇），仿《剪灯新话》，卷篇数相同，构思雷同者甚多。作者序曰：“往年余董役长干寺，获见睦人桂衡所刻《柔柔传》，爱其才思俊逸，意婉词工，因述《还魂记》拟之。后七年，又役房山，客有以钱塘瞿氏《剪灯新话》贻余者，复爱之，锐欲效颦；虽奔走埃氛，心志荒落，然犹技痒不已。受事之暇，据摭搜闻，次为二十篇，名曰《剪灯余话》，仍取《还魂记》续于篇末。”其成就不如《剪灯新话》，但也不乏可读之作，当时此小说集也传到域外。

单篇文言短篇小说最著名的有无名氏的《娇红记》，约为明前期作品，写了一对出身地主阶级的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悲剧。文词幽丽，描述婉转，篇幅稍长于一般文言短篇。这篇小说曾被收入《艳异编》、《情史类略》、《万锦情林》、《花阵绮言》中，在日本也深有影响。

陶辅的《花影集》。陶辅（生卒不详），字廷弼，号夕川老人，明前期安徽凤阳人，曾任应天卫指挥。《花影集》四卷二十篇，仍是仿《剪灯新话》之作，成书于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

邵景瞻的《觅灯因话》。邵景瞻，生平不详。别号自好子。他的《觅灯因话》作于万历二十年（1592），两卷八篇。作者序曰：“万历壬辰，自好子读书遥青阁，案有《剪灯新

话》一编，客过见之，不忍释手，阅至夜分始罢。已抵足矣，客因为道耳闻目睹古今奇秘，累累数千言。非幽明果报之事，则至道名理之谈；怪而不欺，正而不腐；妍足以感，丑可以思。视它逸史述遇合之奇而无补于正，逞文字之藻而不免于诬，抑亦远矣。自好子深有动于其衷，呼童举火，与客择而录之，凡二卷。客曰：“是编可续《新话》矣，命之曰《觅灯因话》，盖灯已灭而复举，阅《新话》而因及，皆一时之高兴，志其实也，而何嫌乎不文。”这篇序提出了作者对于小说作用的见解。

还有明正德、嘉靖年间蔡羽的《辽阳海神传》，后被凌濛初改写为拟话本《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晚明宋懋澄的《负情依传》，后被冯梦龙改写为拟话本《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警世通言》卷三十二），《珍珠衫记》后被改写为拟话本《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古今小说》第一卷）。晚明戈弋居士的《小青传》介乎小说和散文之间；为故城人马中锡（字天禄）所作的《中山狼传》。这种情况清代也有。其他还有姓氏无考的无名字的《刘尧举》、《张幼谦》、《黄损传》。等

比较而言，明代文言短篇小说的成就远不如白话短篇小说。

现今能见到的最早刊印的短篇话本小说，是《清平山堂话本》，明代嘉靖年间钱塘人洪楩辑印。全书原分为《雨窗集》、《长灯集》、《随航集》、《欹枕集》、《解闷集》、《醒梦集》六集。每集分为上、下两卷，每卷五篇，全书总共应有六十篇，所以总名为《六十家小说》。现仅能见到二十九篇，其中有七篇残缺，可确认宋人作品十二篇，元人作品六篇，明人作品十一篇。因为原刻书版心有“清平山堂”的字样，所以近人

马廉在刊印时就取名为《清平山堂话本》。

另有《京本通俗小说》，收宋人话本九篇，其文字则可能为明人修润过。《小说四种》，为万历年间熊龙峰刻印。

天启年间(1621——1627)、冯梦龙编撰的“三言”。冯梦龙生于万历二年(1574)春天，约卒于清代顺治二年冬天(1645或1646)，苏州府长洲县人。《苏州府志》卷八十一《人物》中记载：“冯梦龙，字犹龙，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崇祯时，以贡选寿宁知县。”可见，冯梦龙很有才气；和哥哥、画家冯梦桂，弟弟、太学生、诗人冯梦熊，并称为“吴下三冯”。冯梦龙，字犹龙，亦字耳犹、子犹，别号龙子犹、茂苑野史氏，因居室名为墨憨斋，故笔名常用墨憨子、墨憨斋主人。冯梦龙青年时代生活放浪，出没于秦楼楚馆，对妓女生活比较熟悉。在仕宦途中，并不得意，崇祯三年(1630)五十七岁时，才补了一名岁贡生，曾任丹徒县训导。崇祯七年至十一年(1634——1638)，以六十多岁高龄任福建寿宁县知县。公元1644年，明王朝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了。作为“复社”社友的冯梦龙，编印了《甲申纪事》等，表达了对亡明的追思，对农民起义和清兵的反抗态度。他约于七十三岁时去世。

冯梦龙一生著述甚丰，计有：

短篇小说《喻世明言》(1624)、《警世通言》(1624)、《醒世恒言》(1627)，总称“三言”。每集各有四十篇短篇小说。冯梦龙在编印“三言”时，曾总其名为《古今小说》，分一、二、三刻刊行。后来在刊印一刻时改名为《喻世明言》。接着的两刻，便分别题名为《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因而，人们在说明《喻世明言》时，仍常用《古今小说》的题名。

“三言”中，宋元话本约占三分之一，明代拟话本约占三分之二。

“三言”就作品描写的背景而言，宋代约占一半，明代不足五分之一。

“三言”中，有冯梦龙蒐集的，显然经过了艺术加工；有冯梦龙的个人创作，我们现在已很难辨别清楚了。根据冯梦龙本人所提供的材料——从《三报恩传奇》序可以确知，《老门生三世报恩》出自冯氏之手。另外，根据历史背景可以推知，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等，也可能出自他的手笔。“三言”一百二十篇，洋洋一百五十万言，是集当时流行的话本、拟话本小说之大成。

长篇历史演义小说有：《东周列国志》、《平妖传》、《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两汉志传》、《古今列女演义》等。

民歌集有：《挂枝儿》、《山歌》。

笔记小品集有：《古今谭概》等，包括笑话集《笑府》、《广笑府》等。

戏曲集（即所谓明代传奇）有：创作的《双雄记》、《万事足》；改编的《一捧雪》、《精忠旗》、《风流梦》等十余种。

和“三言”差不多同时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统称“二拍”。作者凌濛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又名凌波，别号即空观主人。十八岁补廪膳生，五十五岁时任上海县丞，六十三岁时升任徐州通判并分署房村。他曾参与对李自成起义军别部的作战。《初刻拍案惊奇》刊行于崇祯元年（1628），《二刻拍案惊奇》刊行于崇祯五年

(1632)。每书各四十篇。但《二刻》卷二十三《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妹病起续前缘》和《初刻》卷二十三犯复，卷四十为杂剧传奇《宋公明闹元宵》，因而，作为白话小说集，“二拍”实有七十八篇。其成就有不及“三言”之处，但某些方面却有超出其右之势。

另有姑苏抱瓮老人的选本《今古奇观》，共四十篇，从“三言”选二十九篇，从“二拍”选十一篇。

在明代还有一些短篇白话小说集，如《石点头》，作者天然痴叟，刊行于崇祯年间（1628—1644）。全书共四十篇，其中较好的作品有《贪婪汉六院卖风流》等。《西湖二集》，作者周清源，其生平及书刊行年月均不可考。现存“二集”中，“一集”已佚失。全书共三十四篇，均以西湖为背景。其中《巧妓佐夫成名》较有价值。佚名的《醉醒石》，内中的《失燕翼作法于前，墮箕裘不肖惟后》、《假虎威古玩流殃，奋鹰击书生仗义》等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佚名的《幻影》中《八两杀二命，一雪诛七凶》也是如此。所有这些，只是明代白话短篇的流风余波，与涌起涛头的“三言”远不能相提并论。

鲁迅指出：“及明人拟作末流，及告诫连篇，喧而夺主，且多艳称荣遇，因护士人，故形式仅存而精神与宋迥异矣。”^①这种情况一直影响到清代。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一篇《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